

我撰「唐代交通圖考」的動機與經驗^{*}

嚴耕望

中央研究院院士
香港新亞研究所教授

一、撰述的動機

歷史是人類在縱的時間上與橫的空間中活動的總現象，是一個整體，所以歷史各方面有其縱的連貫性，也有其橫的聯繫性。研究歷史要注意時間性，這是人人所深知的，但一般都比較忽略空間性。就空間言，大家只注意到國與國之間的問題；但研究一國的歷史多不大注意本國內的區域問題。此在小國猶可，但在中國這樣大的國家就必須注意區域問題。我講歷史人文地理意即在此。

今人研究歷史，除了斷代研究之外，主要是專史，如政治、經濟、社會、民族、宗教、學術文學藝術等史。研究斷代史，必須注意各個地區的情況，纔能真正算是這一時代的全史，而各地區關係的聯繫就涉及交通問題。各種專史，在中國這樣大國中，各個地區也不一樣，必須注意各地區實際情形及其相互間的交流與影響，這種交流與影響，也藉交通而發生作用。所以交通對於各方面都有聯繫的作用，交通可說是歷史研究的樞紐問題之一。此一問題不解決，講其他任何方面的問題，都不方便。所以我研究歷史地理，特別注意交通問題，很想在這一方面下些功夫，使歷史各方面的研究工作者都有一套經過仔細研究繪製出來的較詳確的古代交通地圖可以利用。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又是中古時代的承替時代。中國歷史上的交通網，就低標準言，在漢代已大體完成，但材料太少，只能考知其大體輪廓，直到唐代，交通網才可說真正大定。而就史料言，雖仍無現成的資料可用，不但無全面的，

*：本文為民國八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嚴耕望院士應本所之邀所做演講的全文，由史研所方碧玉、徐菁蓮、簡裕龍、陳中龍及馮玉婷等同學謄寫校對，再經嚴院士修訂補充，特此說明。

也無較豐富的片斷資料可利用，但唐代文獻比漢代已豐富多了，若能花大功夫，就可能實現我這番理想。所以在四十多年前，一九四七年我決心從事唐代史研究時就決定把這項工作視為核心問題來研究。我做問題，一向作面的研究，不專作點的研究。當時我所注意的全面問題是「唐代人文地理」。我構想中的「唐代人文地理」以經濟地理為重心，學術宗教文化地理次之，所以除了行政區劃、軍事建置之外，社會經濟宗教文化各方面問題，凡關涉區域性或可從區域著眼觀察的資料都在搜討之列。交通關涉廣泛，在古代政府分職上，視為兵部的業務，由兵部掌管，近代纔將交通獨立為一個專業部門，但在史學研究上，一般都把交通史作為經濟史的一環，我不免也採取這一觀念，把交通作為唐代經濟地理的一部門，列為經濟地理卷的一個環節。不過我特別重視交通問題，留意寫錄史料亦最精密，又因為牽涉地名考證，所費篇幅不得不特別繁多，自成一部大書，這就是目前正在撰寫出版中的唐代交通圖考。

二、撰述的經驗

學術論著的寫作必然的要分為搜集資料與撰述為文兩個階段，今亦分先後來講：

(一)搜集史料

我常說，上古史中古史的任何問題，資料都不集中，不能說某一問題只看某某幾部書就足夠了，資料分佈的現象非常零碎，那個時代及相關時代的任何書中都有一點，但都很片斷，最詳的資料大都不過幾百字，少或幾個字，有時只有關鍵性的一兩個字，所以要徹底研究某一問題，非把能夠看到的書全部看過不可，唐代交通問題就是個標準的例子。

為了研究唐代交通及其他地理問題，我先看兩唐書，因為這是研究唐代歷史的最基本史料。就史料言，任何時代的任何書籍的內容都偏向某一方面，只有正史，雖也偏多政治軍事史料，但比較起來，仍是較為全面的涉及各方面，所以研究中國古史的某一朝代的歷史，必然的要先看正史，唐代自不例外。兩唐書之外，就是通鑑及有關唐代的政書、地書、別史、雜史、子書、科技、佛藏、雜著、

筆記、小說、詩文、石刻、類書等，以及敦煌資料（就已整理出版者而言）與其他考古資料，這些書籍的時代斷限，以唐人所寫為主，其次宋人著作及隋以前人的著作，大約自漢代到唐五代人的著作，絕大多數都已過目，其次宋人講唐代的著作也大多看過，近人著作大約只以考古報告為主，其次為中日學人關於邊疆史的研究論著。在這些任何書中，發現有關交通問題（不限於唐代）的資料，縱然只是一句幾個字，也抄錄下來，不輕易放過。不過我錄材料儘量以簡節而不失作者原意為原則，不濫抄太多。如遇太長的資料，一時甚難節錄，就只記其內容大略，注明某書某卷某頁，待臨時查用。我在史語所的末期（至一九六四年夏天為止，約有三四年）可有一名書記幫助抄錄資料，我看書時發現史料，用小箋條記明自某頁某行某字起至某行某字止，插在書頁中，由書記代抄，但我必再親自檢勘一過。當材料錄下來時，往往在重要字旁加圈點記號（或用紅筆），或在適當空白處加注幾個字，說明內容要點，或當時意見，備將來用時之參考，當時並不深究。在這樣勤力的仔細的搜錄過程中，不知發現多少意想不到的寶貴資料，這也是研究工作的一大樂趣。

這項工作自一九四七年開始至一九六六年纔開始撰述工作。在這二十年中，當然還寫些別的論著，但主要搜集工作是唐代人文地理，尤其是其中的交通地理問題。我在搜集材料時，只將資料一條條的寫錄下來，分交通與其他人文地理兩類儲存，並不詳細分類，因為預備先寫交通，所以凡涉及兩方面的材料，就先放在交通類。迄撰述前夕，寫錄的交通史料，估計約有七八萬張，有時一張中錄有兩三條材料。

三、撰述工作

這項工作，自一九六六年開始迄今已二十餘年。我寫此書的方法是以區分卷，以路線為篇。即每區為一卷，每卷包括若干條路線。所以在開始撰述時，先將材料按地區及水運與交通制度分為十大類，就是三都、關內、河隴磧西、秦嶺、山南劍南、河東河北、河南淮南、江南嶺南、河運海運及交通制度十類。寫作次序雖不完全與此次序相同，但大體依此順序進行。當分類時，若是一條材料關涉兩

區時，先放入預備先寫的一區中。在開始某一區域的撰寫之前，又就本區資料按路線分為若干小類，然後逐條路線撰寫。

在每條路線動筆撰述時，大體先提出證據，說明這條路線當經過什麼府州，途程若干里。這一點主要採取兩項方法：其一，據唐代與宋初志書、元和志、通典（州郡典）、寰宇記及舊唐志所紀各府州至長安、洛陽的里程及各相鄰接府州間之里距，核算各府州至長安、洛陽當中經一些什麼府州。因為各志書記載往往不同，且有矛盾脫謫處（中國數字極易形謫。故須極細心的工作）。其二，舉出實際史例，如用兵路線，或當時某人曾行此路。此兩項方法，有時可互相補助。路線大體定了，然後再考途程所經的詳細情形，諸如縣、軍、鎮、戍、關津館驛、峽谷地形，亦頗及歷史事蹟、民族互市種種情形。每條路線的材料自以唐代為主，但亦涉及秦漢魏晉南北朝，且偶及宋代。此固由於為講明唐代，有上下貫串明其承襲之必要，亦以便利唐代以外之史學工作者可資參考。

在撰寫時，定線只是大體工作，除了少數路線如烏蘭關道（長安涼州道之北線）、滇越道等定線困難之外，大多還算是不太難解決的問題。而最麻煩的工作是途程所經詳細情形之考證，為精益求精，往往一個小地名花費兩三千字三番五次的改易，不能定稿。這也許是過於求真的毛病。

下面再詳一點談我寫此書時討論問題的方法與經驗。

前面說，在寫錄材料時只作標記注明當時意見，並不深究，等到排比材料，開始撰寫了，因為材料有時感到太少，彼此脫節難作穿貫，有時又感到材料太多，往往糾纏不清，或竟彼此牴牾衝突，難作判斷。有些處又顯材料本身不合理，但亦不能主觀的輕易的棄而不顧。這些處都會使人感到難以下筆。所以論文寫作階段實際上比搜集資料階段要困難得多。我常說論證文字，有述證與辯證兩類。述證文章的寫作比較容易，主要工作在搜集資料，資料準備好了，排比材料即可成文，較為省事，但述證文的寫作實際上等於較高級的編輯工作，在論文寫作上，是比較低層次的；辯證性的論文，纔是比較高層次的論文，在寫作技術上，寫作過程上，比較難得多。但純辯證性的論著只限於較短的論文，長不過幾萬字，大著作大都是參合兩種性格的論著，而述證的分量總比較多。我這部書有些處是述證性的，有些處是辯證性的，遇到上述種種困難情形，就必須用辯證方式來解決，

運用縝密思考，在繁雜中尋出頭緒，在衝突中辨其是非，或者游刃兩者之間，化衝突為融合，在不合理中說明其何以不合理，有錯誤，甚至要說明其錯誤之故。在這樣複雜思考過程中，通常還要臨時查書。有時就已錄材料覆查原書，仔細看其上下文，有時翻查工具書，如讀史方輿紀要、大清一統志、水經注圖、清代與現今較詳地圖等等；（這些工具書往往又有可查的工具書，如紀要、一統志都有索引。）有時尋查其他可能相關史料作輔證。尋查相關史料，大多要憑聯想力，有時也利用工具書。這種查書工作，有時有重大發現，可以幫助解決問題，有時完全落空，白耗很多時間。不過我從不氣餒，再想別的辦法解決問題。我所謂「無孔不入」，在辯論問題時，就往往用得到。

在寫作時，一項問題的解決往往不是一時可以達成正確結論的。有時成稿當時，自己已懷疑這項結論未必正確；或者只是大體如此，尚不精確。有時自己以為正確不應有問題了。不論自己以為已很正確，或者尚有可疑，文成之後仍要隨時思考，是否還可作別樣解釋；更要隨時留意是否尚有別的材料可作更好的證據，或者可憑以修正原結論，使能更為精確；或者可作反證，足以把原先的結論完全推翻。所以此書各篇寫成之後，都經過不只一次的增補或修正，就是在期刊中初步發表，也多半不是真正的初稿了。就現已出書的前五卷中，正篇五十三文、附篇九文，大半都已在期刊中發表過，但在這次正式出版前，除了極少數的兩三篇之外，我都大加修改過。有些篇改得太多，必得部份重抄；有些篇更是完全重新改作。原來結論雖然大體維持不變，但也有自己推翻舊結論重立新結論處。所以此次正式出版各篇內容，與以前發表的論文比較，很多論證更見精密，也有些斷語已完全不同。而且有些問題，以前論著中曾先後提出不同的推論，這次改訂出版，論斷又有不同。茲舉一兩例如下：

例如天德軍與沃野鎮故城。二十年前，我寫北魏六鎮考據寰宇記四九雲州雲中縣條引入塞圖及元和志四天德軍條，約略推論鎮城約在E108. N41° 30'地區，軍城在鎮城南六十里。一九七二年寫唐代長安北通豐州天德軍驛道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六卷一期）作較詳密推論，擬定天德軍城在今烏蘭鄂博（E108° 30' .N41° 17' - 20'）或稍東。一九七六年在烏拉特前旗阿拉奔公社境內發現唐人王逆修墓誌銘，為天德軍都防禦馬步都虞候，「安瑩手軍南原五里」處。

墓北約二公里處確有一座古城，可以肯定就是唐天德軍城位置。文物一九七七年第五期有報告，但無較詳地址，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云此城在公社之北，然皆未繪地圖，亦未標明經緯度，所以定點仍有困難。後來改訂前文為豐州天德軍驛道篇時，檢國防研究院民國地圖集之綏遠人文圖，在烏蘭鄂博稍北有阿拉恩格小地名（約 $108^{\circ} 30' \cdot N41^{\circ} 25'$ ），以為報告所謂阿拉奔公社蓋與此相近，認為此問題只能到此為止，作為定稿付排了。到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無意中看到張郁唐王逆修墓誌考釋（內蒙古文物考古創刊號，1981年）雖然仍無地圖，亦未標經緯度，但對於此墓位置報告較詳，是在烏梁素海東岸前後烏拉山所形成之明岸川西端。我根據此項線索再檢視0XC-F-8圖及民國地圖集，其地當在烏蘭鄂博東南， $E109^{\circ} \cdot N41^{\circ}$ 西北，烏梁素海之東北岸。沃野鎮城即在其北六十里也。所以二十年中，我對於此問題已依據材料獲取情況，先後作四次討論，定其地望。

再舉一例，百牢關的位置。元和志說此關在西縣西南三十步，（地志記距離往往以步計）輿地紀勝說三十里。我在一九六七年寫通典所記漢中通秦川驛道考初稿，從三十里之說，明年定稿改從三十步說（刊新亞學報第八卷第二期），一九八三年改定編入此書時（第三卷，篇二十），又從另一角度加以論證，仍從三十里之說。但仍只能從各方面作推論，並無堅強證據，心有所憾。一九八五年十月中央博物院景印宋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詩出版，我購得一部，乘興急讀一過，並取景宋本分門集注杜工部詩作參考。前文中本已引杜翁夔州歌「瞿唐險過百牢關」一條，但仇氏詳注引圖經甚簡略，難據立論。今檢分門集注杜詩卷四夔州歌，集注師氏引圖經云百牢關「故基在今興元西縣泥口化檢玉觀山下，傍臨白馬河，…河之西南，壁山相對六十里不斷，蟠冢漢江水流其間，與白馬河會…。」（新刊校定集注杜詩卷三二杜田補遺引圖經較略）是關正當白馬河與蟠冢漢水上源之會流處，是在西縣之西三十里之鐵證，決非三十步。但該篇編入卷三，其時已印畢，無法再改，所幸第四卷金牛成都驛道篇仍提到百牢關，此時雖也已付印且二校定稿，但仍商之印刷廠在三校稿中補此一條，了卻一宗疑案。（看原書頁867.90 5.）

以上兩例，一個幾度推論，逐步接近史實，一個反復論證，終於探得真像。如此事例甚多，這不過舉其最標準者耳。

此外我在此書寫作過程中，深深體驗到兩項經驗：第一，做深入精細的工作，要有絕大的耐性。在搜集資料時，固然要能耐煩的持恆的長期工作，不能躁急，尤其在寫作時，更要有耐性。往往翻開繁雜紛亂的一大堆材料，一時摸不著頭腦，不知如何處理。但不要心急，只要能耐煩的慢慢的思考摸索，絕大多數都能找出一個合理的處理方法。有時本以為亂雜無章，脫謔百出的材料，卻原來也自有線索可尋。得到線索後，那些雜亂的材料卻可能變為極寶貴的材料。舉個最顯著常常碰到的例子：通典州郡典、元和志、寰宇記等志書記述州郡里數甚詳，但往往有脫、有衍、有謔誤，又彼此不相應；武經總要更是如此，所以岑仲勉先生就頗輕視總要，以為無用。但這些都是很難得的早期較詳紀錄，極為寶貴，雖然因為中國數字極易互謔，但取幾部書仔細比勘，兼參考鄰近州郡一些數字，精心推求，大多仍可得其大體正確數字，幫助解決問題。第二，對於同一史料，仔細分析與粗略瞭解，差別極大。粗略瞭解，只能得其模糊粗略的概念，甚至認識錯誤；必須仔細分析始能很準確的瞭解其真象。今先就水經注材料舉兩例如次：其一，二十餘年前，我寫北魏六鎮考，據水經注之沽水注、鮑邱水注與滯水注三篇，討論北魏禦夷鎮當在今察哈爾的沽源縣、獨石口間，或稍東數十里地區，（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頁七〇九）但一九八二年撰居庸關北出塞外兩道篇之東道居庸關北通禦夷故城及契丹炭山道（篇四九），雖仍據此三注為基本史料，但分析比勘精密，認為鎮在沽水東源大谷尖谷兩水之間，約在今雲州堡（ $E118^{\circ} 40' .N41^{\circ}$ ）獨石城（ $E118^{\circ} 4' .N41^{\circ} 25'$ ）之正中間，約 $N41^{\circ} 10'$ 地帶，靠近沽水處。比較前作準確得多。其二，水經河水注記中陵水上游的流程詳至三四百字。中陵水即今紅河（在綏遠省東境，於 $N40^{\circ}$ 之南，西流入黃河。）此無可疑。楊氏水經注圖繪此水亦詳，大體可信。但繪沃水枝分及沃陽故城、皆在今長城之南，以參合陁為今長城之一陁口，則有問題。一九七八年，我撰太原北塞交通諸道篇（刊新亞學報第十三卷），定稿在圖考篇三七也據酈注此文，參稽今日較詳確地圖，（主要為OX-C-F-8圖及民國地圖集相關各圖。）詳加分析比勘，發現酈注所記與今圖完全吻合，沃水枝分當在今長城之北，沃陽、參合故城亦皆在長城之北，楊氏因理解粗略，致誤，或兼當時無較精地圖之故。沃陽、參合為北魏首都平城西北

通雲中盛樂大道必經之地，也是唐道所經之地。

再如新唐書地理志末附載唐入四夷七道，其第三道由夏州北經胡洛鹽池（今大鹽海子E108° 20' N.40° 5'）渡黃河至安樂城、大同城，又經北魏沃野鎮故城。此下又東北經諾真水，折東南至古雲中城。自沃野以下凡十五個地名，一百五十六十字，可謂甚詳悉，但除了西端沃野，東端雲中城外，所有地名皆不詳，所以古人無能言其路線者。我本來也不擬詳加研究，後來發現諾真水有其他史料可供作進一步研究。諾真水者在黃河外，以中受降城（今包頭之西黃河北岸的E109° 30'處）為圓心，半徑三百里之弧形線上。又根據新志本條所記，諾真水西南，至沃野鎮五百數十里，東南至雲中古城約近四百里，即至兩地之距離約為五與四之比。根據此三項數字及比例，檢視今圖，此諾真水即今艾不改河及其下游哈爾紅河，水必即今哈爾紅河東源（塔爾渾河）西源（艾不改河）合流處之百靈廟（E110° 28' N.41° 40'）地區無疑。然後再就新志所記地名里數與今圖相比勘，知詰特犍泊，即今伊克湖（E109° 30' S.41° 40'）可汗城即今成吉思汗城，鹹澤即今乾涸之烏蘭諾爾，於是此道路線大明，絕無可疑。並且因而發現唐代北邊國疆上兩個據點，及所謂突厥南庭之黑沙城。這些都可說是重要發現，因此撰成天德軍東取諾真水通雲中單于府道篇，收入本書第一卷（篇九），這也顯得仔細分析功夫之可貴，兼見詳確地圖對於研究歷史地理極為重要。

此外我想附帶談談此書寫作形式的問題。我寫論著，不但自己寫得非常認真，不敢隨便說話，同時也注意給讀者便利。為了便利讀者，所以在體裁上很注意，務期讀者容易掌握線索，易於瞭解與利用。這部書考證繁複，可譏為煩瑣史學，但為徹底解決問題且以取信讀者，又不得不花費如此多篇幅來證實我的論點。但文章實在太繁了，若用一般「常行體」，必然使讀者如墜五里霧中，一時摸不著線索，所以採用「綱目體」，而且綱文用大號字，目文用小號字，以期醒目易辨，（過去逐篇發表，限於期刊本身體例，不使用大小字分別綱目，易使讀者有些迷惑。）在行文中，所有材料考證，都放在目文中，綱文只就月文中諸般小結論連貫起來，為一篇簡要散文，全無考證氣味。這樣能使讀者易於接受，便於利用。又各篇中，有些每篇繪製一圖，有些數篇合繪一圖，可謂將綱文地圖化，更便讀

者能直覺領受，易於運用。每冊之末，附刊綱文古地名引得，以增加檢讀之便。爲了古今地名常有改易，綱文中所有古地名，皆用括弧注明今地。但今地名將來亦可能改易，彼時讀者仍會感到困難，故有些地名，尤其邊疆地名，注明經緯度，將來地名縱有變易，讀者仍可據經緯度推知其地之所在。只可惜爲事勢所限，不可能全部註明，凡此種種，皆爲讀者著想，增加讀者之便利。

最後我想就這部書作一點自我批評，此書所涉範圍極廣，自必有不少錯誤。自前五卷刊佈以來，發現幾處有問題。最重要的必須更正的錯誤，就在第一卷第一篇兩京館驛篇，考長安都亭驛，既據續僧傳的玄奘傳及其他文獻論定都亭驛在城中心區朱雀街西，又據長安志，城之東南隅曲江池北敦化坊另有一都亭驛，我據長安志位置此驛時，本已懷疑，但無史料可據以否定，長安志爲北宋人所撰，爲講唐代長安城的最基本史料，故姑存之。書出後，讀辛德勇隋唐兩京叢考，第三十三節，據久不傳世的元人駱天驥類編長安志，證明自明清至今傳世的長安志敦化坊下一段文字，原本在城中區的通化坊下，誤移植在敦化坊，所以今本敦化坊的都亭驛就是玄奘傳等處所見的都亭驛，不是別有一驛。我寫其他論著也有些與此相類經驗，就是凡史料看來不合理可疑者，往往真有問題。又此書考論誠有不少收穫，但有個大弱點，只在古人文獻中鑽尋，不能親至各地目驗實況，也不能遍搜明清方志作參考，所以有些結論可能有再商酌處；只是此事不易，不是我個人之力所能做到。現在只能成此一規模，如果他日有人取此書爲線索，作實地考察，並參考各種方志，對於此書加以斧正最好。